

薩特與造反理性觀

• 于奇智

在西方思想史上，薩特是為數不多的幾位把文學和哲學結合得最好的思想家之一，在文學和哲學兩大領域都獲得了巨大成功。薩特一生有關「政治」的著述，並不亞於他的文學創作和哲學書寫。他追尋着「政治」與「理性」間的關係，《造反有理》便是這一追尋的理論成果。

本文試圖站在法國「五月風暴」之後的社會背景乃至目前國際政治形勢之下，以對話錄《造反有理》(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 為重點，分析薩特 (Jean-Paul Sartre) 的政治哲學思想，其中心論題是「造反」與「理性」及其內在關聯。本文不求全面，但會重點闡述以薩特為代表的法國左翼知識份子參政論政的社會影響和歷史意義，探討法國知識份子如何推行一個爭自由、反壓制、持正義、向善心的社會政治主體的經驗。

—

在西方思想史上，薩特是為數不多的幾位把文學和哲學結合得最好的思想家之一，在文學和哲學這兩大領域都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本來，他對政治漠不關心，但政治卻始終與每個人相關，衝擊着每個人的生活，薩特自不例外。

縱觀薩特一生及其著述，其中有關「政治」的，並不亞於他的文學創作

和哲學書寫。政治既是一種生活體驗，又是一種寫作訓練，更是一次自由冒險。他熱衷於遊行、訪談，支持1968年學生運動，和福柯 (Michel Foucault) 等人一起為政治自由和政治正義而冒險。試圖通過「政治介入」把「自我」他化。在這一介入過程中，薩特追尋着「政治」與「理性」間的關係，《造反有理》便是這一追尋的理論成果。

作為社會活動家，薩特的政治興趣絕非是枝節性的，因為這改變了他關於「知識份子及其作用」的看法，他本人也對法國乃至整個西方社會有極大影響。薩特從戎，做戰俘，參與抵抗運動，支持學生運動，參加保衛移民遊行，會見前蘇聯異端份子，發表政論、演講及訪談……對於政治，經歷了從漠不關心到比較主動，更而日益積極活躍的過程。這個過程使薩特得以「脫胎換骨」，努力地自我否定，使他認識到知識份子在造反中成長為知識份子。這為知識份子設計了新形象。這一新形象與傳統知識份子大相逕庭，薩特的立場不再是無產階級，而是大眾。

* 此文是壓縮稿，全文及完整註釋將刊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www.cuhk.edu/ics/21c)，有興趣的讀者可到網上瀏覽。

薩特認為，社會成員應該為某種突發性暴力(如造反、暴動、反叛)辯護，甚至加入暴力運動之中，以改變歷史，破壞歷史目標，進而達到完全的道德自由。哲學上的「他人即地獄」強化了政治上的「反抗」。

薩特將「造反」(révolte)與「理性」(raison)聯繫起來，造反與理性之間的關係是政治與理性之間的關係的進一步深化和具體化。他主張「造反有理」。造反是發動反抗行動，這一行動是為了實現造反意圖。造反要求造反者理智地運用和控制造反權(pouvoir de révolte)，有理由有道理地進行，這就是造反理性。造反是一種行動，因此，造反理性就是行動理性或實踐理性。

造反者反對王權，反抗暴君暴行，反對陋習、壓迫、暴政、不公、恐怖，抵抗侵略和非正義戰爭。如果不把握造反的尺度，就會走向極端：反一切。當某個社會進入「造反時期」，造反者必須樹立「造反精神」。造反就是同屈從、順從、服從、屈服、歸順、因循守舊、順從大流及其觀念作鬥爭。

二

《造反有理》是一對話集中的一次對談，並作為一系列對談的總題，發表於1974年，由伽利瑪(Gallimard)出版社出版。在這些談話中，薩特主要講述自己的政治生涯，力圖闡述1968年以來左翼思想狀況，以及他與政治的關係。在他看來，參政有理。政治生活是一種你不找它它卻總是上門找你的東西。一個人要想真正擺脫政治，幾乎是不可能的。《造反有理》

這次對談，是在1972年12月進行的，與薩特對談的有維克多(Pierre Victor)和加維(Philippe Gavi)。我們在閱讀《造反有理》和與之相關的另一篇文章“Qu'est-ce qui fait qu'un petit bourgeois ou un ouvrier se révolter?”(〈甚麼東西使小資產階級或者工人造反?〉)(1973年1月)的時候，發現薩特在對話中顯得不那麼主動，好像被維克多和加維牽着鼻子走。

在道德倫理的起源問題上，維克多固持猶太教立場。這顯然與薩特相對立。但在雙方爭論中，維克多是勝者。薩特招維克多作學術秘書，是為了幫助自己探索政治哲學思想。結果適得其反，維克多變本加厲，使薩特讓步和投降，進而使他放下手中的思想，特別是體現在《辯證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中的博愛觀。這是薩特不會答應的。

薩特處於甚麼地位?加入左翼後又如何介入其核心?他在當時根本無法具體地設想和實現，自己好像表面上處於維克多和加維的左翼中心，但實際上不是。維克多和加維圍繞在薩特身邊，實則是更好地借薩特的名位(被視為青年精神領袖)，實行自己的意圖，迷惑公眾。關於造反，薩特發表演說、表達觀點，就是重述預先安排好的言論和主張。在法國60、70年代的風暴環境中，薩特與維克多、加維等人確定建立了策略聯盟或論說勢力關係。

我們在討論「造反有理」這一問題時，儘管不全然是關於薩特本人的思想，維克多和加維僅僅是薩特的「同謀替身」，但由於薩特始終處於「介入狀態」，因此，還是應把薩特、維克多和加維的「話」作為整體來考慮。

薩特在《造反有理》中，主要講述自己的政治生涯，力圖闡述1968年以來左翼思想狀況，以及他與政治的關係。在他看來，參政有理。政治生活是一種你不找它它卻總是上門找你的東西。一個人要想真正擺脫政治，幾乎是不可能的。

造反意味着破壞舊秩序，意味着災難，意味着社會原結構的失敗，使社會暫時處於混亂狀態，甚至使社會走向破敗。混亂則會令人不安、慌亂。人們生活在這種環境中是不幸的、悲慘的。為了改變這一狀況，必須起來造反。這是道德良心的指引和使命的召喚。

從有關資料表明，薩特在1970年至1973年間受法國無產階級左翼影響，並把自己看成是其中的一位代表。《造反有理》這本談話錄更是薩特在「無產階級左翼」中經歷的有力見證。他的言論和觀點無疑是左翼的。在《造反有理》這次訪談中一開始，薩特就說①：

對你們來說，當然是實踐先於理論。理論如果存在，則據實踐而產生——完全合理的思想，我們都以某種方式擁有這一思想——但是實踐本身包含某一思想。重要的是行動，行動自身則被思想作為推論的基礎。於是，我們想知道你們如何在一定時機預見某項活動。你們的目的是甚麼，你們怎樣構思口號、設計標語，就一定的活動而言，你們的戰略觀和策略觀是甚麼——我們選擇其中任何一個。你們如何隨着十分特殊的活動從你們在某個地方沒有行動的時刻轉入你們行動的時刻。

薩特一開始就給維克多、加維提出「實踐」、「行動」、「活動」、「理論」、「思想」主題，這些字眼及其相互關係，把讀者引向複雜的社會、政治、制度、經濟、文化等領域。「造反」這一反抗行動不僅僅是理論問題，更重要的是實踐。薩特把「行動自身」(acte lui-même) 視為「造反論」的「根據」。造反的預見、目的、口號、戰略觀、策略觀等，是造反的基本問題。「實踐」高於「本本」。理論與實踐的本質是甚麼？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究竟是甚麼？

維克多接着說②：

首先知道這種毛主義思想何以誕生，似乎是重要的。嚴格意義上的毛運

動，在破壞的基礎上出現於1968年秋。這種破壞不僅僅是共產主義青年聯合會(馬列主義的)這個組織的破壞，而且是整個意識形態體系的破壞……1968年5月10日以後，在「馬列主義」陣營，我看到了意識形態災難。

意識形態災難是甚麼？薩特接着提出的這一問題觸及了問題的實質。

這就是重建時代的思想和看到法國當時通行的思想。重建意味着決裂與解構，時興的思想意味着傳統思想的破敗和傳統信仰的危機、新思潮的誕生和新信仰的確立。

1967年以來，知識份子，特別是大學生，往往以唯一的方式破壞大學：與知識份子傳統決裂，與大學決裂，與工農相結合。但無產階級左翼知識份子還沒有對大學的「特殊實踐」進行思考。知識份子應當與生產者結成聯盟。當時的左翼知識份子受到某股意識形態潮流的制約，但在60年代共產主義運動危機中得到鍛煉。在阿爾及利亞戰爭結束時，社會秩序嚴重混亂，法國也如此。反混亂，是為了還社會於秩序之中，還民眾於穩定之中。

造反意味着對舊秩序的破壞，意味着災難(désastre)，意味着社會原結構的失敗，使社會暫時處於混亂狀態(désarroi)，甚至使社會走向破敗。混亂就會令人不安、慌亂。人們生活在這種環境中是不幸的、悲慘的。為了改變這一狀況，必須起來造反。這是道德良心的指引和使命的召喚。

恰恰在1968年「五月風暴」前夕，法國思潮也表現在兩個方面：與大學和研究機構決裂，這是積極的一面；

與強加於大學生和工人的正統理論體系信仰和某些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信仰決裂，這是消極的一面。這表明當時的法國人處於極其深刻的信仰危機之中。決裂是一次分娩式的陣痛，意味着在舊關係的鏈條上劈開了一個口子。它們原有的關係中本來就存在着斷裂點，這一斷裂點正是決裂的突破口。大學生和工人希望尋找新的信仰，試圖得到信仰自由，不是被動接受強加給他們的一切正統信仰，而是主動積極地自由選擇新的信仰。自由選擇是擺脫正統信仰的開始，也是解放的開始。維克多一幫左翼知識份子與其他知識份子不同，他們並不迴避信仰危機的發生。信仰危機標明人們懷疑已有的主張、理論、學說、準則、宗教等思想，人們對政府持懷疑態度，對政府投不信任票，試圖擺脫強加於他們身上的各種主張、理論等，反對政府，解除政府的壓迫和束縛。造反的任務就是擺脫危機，獲得自由。信仰危機必然產生波紋效應：經濟危機、政治危機、文化危機、社會危機，等等。在他們看來，「五月風暴」正是這種信仰危機的深刻體現。1968年5月10日後，馬列主義共產主義青年聯合會宣布解散，其成員被分散到此前成立的「行動委員會」(Comités d'action)。5月13日，全法總罷工宣告開始。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人們根本無暇思考所發生的一切。

三

「五月風暴」之後，維克多等人建立了無產階級左翼，以捍衛從「五月風暴」所取得的成果。左翼思想顯然

與「五月風暴」這一事件有關。他認為，這一事件的基礎是法國專制馬克思主義的破滅。法國專制馬克思主義表現為兩種形式：修正主義與傳統馬列主義(經過修改的)。法國這場大規模群眾運動與法國共產黨及其馬克思思想相對立^③。對立意味着距離，意味着對立者與對立者之間不和，導致搏鬥、衝突、爭端。搏鬥、衝突、爭端往往表現為心理、精神、理論、言論、武裝、利害、管轄權(職權和權限)等方面。這就是對立的範圍。對立雙方處於完全不同的兩端，一方總是以強力對抗另一方。對立不僅體現為物質的，而且體現為精神的；不僅體現為人的，而且體現為物的；不僅體現為政治的，而且體現為經濟的；不僅體現為個體的，而且體現為普遍的。對立意味着合力的喪失。合力是一致的動力，一旦喪失就使固有的聯盟破碎。合力的喪失使協調關係趨向矛盾，使形勢動盪不安。

法國共產黨患了嚴重的「偏執狂」。任何專制只要對準廣大公眾，都會遭受反對。專制是一種權力，代表國家元首的意志。國家元首行使權力往往是獨斷而專橫的。為了保證專橫權力的順利行使，必須依靠一個絕對專制的政體。如果這種專制體制成了一國主體政治並成為鞏固的統治模式，那麼，該國必奉行絕對專制主義。這就是專制的權威性。造反理論的功能在於否認專制權威性的依據，造反實踐的作用在於破壞專制權威的基礎，從而使造反者不堪忍受的獨裁者政體得以最大限度地毀滅。造反是改天換日的希望。「五月風暴」份子的「做」建構了思想與實踐的關係。維克多強烈抨擊了工會的「打入內部」這一

恰恰在1968年「五月風暴」前夕，法國思潮也表現在兩個方面：與大學和研究機構決裂，這是積極的一面；與強加於大學生和工人的正統理論體系信仰和某些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信仰決裂，這是消極的一面。1968年5月10日後，馬列主義共產主義青年聯合會宣布解散。

法國60年代思潮，反壓制行動在理論上得以系統化。毛澤東思想正好包含了當時法國運動中造反者的要求，正是他們尋求的思想，植根於法國政治現象中。法國毛主義出現了。實踐和實踐思想閃現於法國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心中。就1968年法國學生運動而言，解放就意味着打破陳舊而奴化的政治標準體系。

愚蠢辦法。在「五月風暴」的洗禮下，工人階級學會了思考，提高了覺悟並促使和引導他人思考。工人必須為自身利益和合法權利而鬥爭。這種生死攸關的鬥爭必須和代表他們利益的知識份子的鬥爭理論相結合，才能取得勝利。

獨裁壓制猶如一場「褐色瘟疫」，意味着暴行。獨裁者必然對異己份子和人民實行鐵腕統治和殘酷鎮壓（比如前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 [Augusto Pinochet] 的暴政）。時至今日，還有不少人丟掉了歷史，居然把起碼的政治正義作為假民主、假人權、假人道的政治交易。這是血腥獨裁的復活。儘管皮氏獲釋回國，然而還是一個永遠的罪犯。更有甚者，醜惡的新納粹興起，其勢頭並不亞於老納粹。英國歷史學家歐文 (David Irving) 在《希特勒的戰爭》(Hitler's War) 一書中公然否認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史實，並把他捧為「理想主義者」，企圖重新界定納粹，為之賦予「合法性」④。從現實上看，歐洲大地上存在着具有極強政治影響力的種種極右勢力，比如法國的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德國的極右政黨、意大利的極右政黨全國聯盟、比利時的佛蘭芒集團、瑞士的極端保守黨人民黨、奧地利的極右派自由黨，不勝枚舉。這些勢力十分猖狂，納粹的幽靈尚在。這充分表明反納粹的使命遠遠沒有完成。

哪裏有壓制，哪裏就有反抗和鬥爭的實踐、聲音與理論。壓制有時是血腥的。壓制是應當遭到反對的，因為它是一種邪惡而令人恐怖的血腥力量，意味着受壓制者喪失尊嚴、自由、財產、居所等等。造反者為了擺脫這種力量，捍衛自由、民主、善

良、安寧、鎮靜，必須無畏地反抗壓制，重新顯示人性的最大威力。壓制別的存在者的存在者是不能得到尊重和自由的。壓制本身也是一種克制力量，也可以被克制，這依賴於反壓制的壓制力量。造反者站在正義的立場上遣責和平息非正義的壓制力量。反壓制是一場政治鬥爭。

在法國60年代的思潮裏，反壓制行動在理論上得以系統化。1968年以後，無產階級左翼的思想是為解放群眾、實踐思想提供理論指導。被壓迫者的社會運動需要思想指引。毛澤東思想正好包含了當時法國運動中造反者的要求，正是他們尋求的思想，植根於法國政治現象中。法國毛主義出現了。解放 (libérer) 就是把被壓迫者從專制之下解救出來，使他們擺脫傳統思想障礙，釋放群眾運動的力量。實踐和實踐思想閃現於法國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心中。造反者應該解決從被壓迫者的社會實踐內部反對奴役體系的造反手段問題。為了解放，被壓迫者必須造反。求解放就是脫壓制、爭自由。就1968年法國學生運動而言，解放就意味着打破陳舊而奴化的政治標準體系。學生喊出“Grappin nazi”（「格拉潘是納粹份子」）的口號。

誰是真正的造反對象？是各行各業的「頭頭」？不是，不是，而是人為的體制和制度，比如剝削制度、教育制度、政治制度、經濟制度、軍事制度、文化制度、種族制度、婚姻制度、性欲制度、欲望制度……這些體制成為人們（工人、學生、知識份子、百姓）的壓抑性壟斷體系。壟斷體制擴展到了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完全成為人們的對立力

量。我們把這種現象稱作「體制異化」。壓抑性壟斷體制是專制或獨裁的一種表現形式，它與民眾是水火不容的。因此，衝突必生，暴力必發。

四

如何擺脫壟斷體制而獲得自由？在尋找走出舊體制獲得自由的道路之前，必須落實到理論問題上。1960年代，西方出了個毛主義，可謂「二十世紀西方盛景」。毛主義被法國人引進，很快使法國激進運動毛化（或者當時政治境遇下的一種中國化）。這為法國激進運動的深入發展鋪墊了道路。法國毛主義就是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 (maoïsme antihiérarchique)，它「就被壓迫力量的本質，就個人、文化、政治的錯綜複雜以及解放鬥爭的標準提出了基本問題」^⑥。薩特、列斐伏爾 (Henri Lefebvre)、阿爾都塞 (Louis Althusser)、福柯等都與毛主義有過密切關係。法國左翼勢力極強，不僅表現在國內政治、經濟等領域，而且表現在對外軍事控制方面，比如，1956年至1962年間，法國人企圖把阿爾及利亞劃入自己的版圖，並以戰爭途徑來達到這一目的。

阿爾及利亞戰爭導致了法國第四共和國的垮台和戴高樂 (Charles de Gaulle) 領導的第五共和國的誕生 (更加危險的獨裁出現)，還成為激進的青年運動和反戰運動的主導因素。戴高樂政府更加殘酷地以武力鎮壓反戰示威和對付教育問題。實行專制的目的是更加嚴格控制制度的內在結構，維護政權的合法性和權威性。造反就是擺脫和拒斥這種專制的限制和控

制，達到自治，獲得自由，爭取控制權和自由權。如何才能實現自治呢？這是一個具體的行動問題。維克多指出^⑦：

殺害小頭目或者監禁幹部，這給工人思想提供了一種手段，為了他們在社會實踐中同奴役制度作鬥爭……人們應該包容一切獨斷馬克思主義變體。工人思想，如同堤內之水，蓄積於等級制度裏，這種思想閃現於造反之中……造反產生新思想。我們的工作在於使就奴役制度而言的不規則成為新的規則，使邊緣行為成為中心行為。在政治宣傳中，顛覆活動是重要的。

對抗性制度是一股強力，而爭取自治和自由的造反行動分散且軟弱無力。造反者的對手總是很強大，他們擁有軍隊、政權、機構，佔據了社會各領域。毛澤東通過人民戰爭來解決政權問題 (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這大大啟發了法國的造反者，他們必須最廣泛地聯合工人和學生，在1968年「五月風暴」中喊出了「敢想敢說敢做」的口號。科恩—本迪特 (Daniel Cohn-Bendit) 是學生運動的領袖 (著名的「紅色丹尼爾」)，他和無政府主義者佔據支配地位。這表明，不僅有造反的行動，而且有造反的思想，還樹立榜樣。監禁火車站站長、工廠老闆、大學校長、大學區區長等。對當局來說，監禁是非法的，造反是違法行為，造反者必然遭到鎮壓和監禁。這裏存在監禁與反監禁、抗拒與反抗、造反與反造反、反抗與反反抗的對抗性問題，它們形成兩大勢力的對立，劃定了有理與無理、合法與

1960年代，西方出了個毛主義。可謂「二十世紀西方盛景」。毛主義被法國人引進，為法國激進運動的深入發展鋪墊了道路。毛澤東通過人民戰爭來解決政權問題，大大啟發了法國的造反者，他們必須最廣泛地聯合工人和學生，在1968年「五月風暴」中喊出了「敢想敢說敢做」的口號。

薩特的問題是，造反與理性之間究竟有何聯繫？如何運用造反權？有理造反，是一種革命行動，造反必須聽從於理性，受理智控制和指揮，還允許人們議論、爭辯、思考。作為造反者的旁觀者，應當擁有足夠的評判力，能夠從眾多的造反行動中辨別出哪些是理性造反，哪些是非理性造反。真正的理性可能阻止反動的造反。

非法的邊界。事實上，統治當局對內奴役，對外擴張，這才是真正的非法行動和犯罪行為，必然引起被壓迫者和被殖民者的反抗。這充分表明理性與合法性在被壓迫者和被殖民者一方。

在造反過程中，造反者必須付出巨大代價，必須參與有理造反。造反的目標就是砸碎舊的等級制度，維護和堅持等級制度的人也是造反所指向的目標。砸碎等級制度及其權威人物、強大勢力就是被壓迫者與奴役制度進行生死鬥爭，鬥爭具有階級性且必然付諸武力。一切鬥爭對象都是鬥爭者的對立面。只有消滅對立面，生存權問題才能得到解決。在鬥爭過程中，造反者與被造反者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雙方的力量對比也是變動的，雙方的思想、觀點、立場也是對立的，因此，除了造反行動的較量外，還存在着造反思想的較量。造反者的思想在造反行動中必然顯現出來，並指導着造反行動。造反者與專制、壓制、等級制度及其權威人物的鬥爭是正義的。正義的造反，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人們是會堅決支持的。因此，造反有理。有理造反行動是新的造反思想的源泉。造反是對舊的政治力量、奴役制度、體制結構的破壞，必然引起社會動盪，發生流血事件。

1972年2月25日，前雷諾汽車廠工人、無產階級左翼毛主義份子奧維尼 (Pierre Overney) 被開除之後，仍回到工廠門口，與同伴一起向工人散發小冊子，與工廠安全部門的頭兒特拉莫尼 (Jean-Antoine Tramoni) 發生爭吵，特拉莫尼開槍打死了他。這一事件激起了工人的反抗。不少工人因反

槍殺事件而被開除，但仍回廠呼籲工人起來造反，遭到保安人員攻擊。對此，毛主義份子十分不滿，不僅抗議，而且把矛頭指向政府的高級官員，比如比朗古爾 (Renault-Billancourt) 最重要的人事官員諾格雷特 (Robert Nogrette) 被他們監禁在一秘密處所。他們還關押工廠老闆，並讓老闆妥協。政府當然會施加壓力，造反者也會提出一些釋放被監禁者的交換條件。雙方互相退讓，被監禁者會得到釋放，被開除的工人也會恢復工作。

監禁和釋放都是有條件的。此起彼伏的運動表明，監禁、釋放、再監禁、再釋放，是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被監禁者因監禁而失去人身自由，因釋放而恢復人身自由。監禁和釋放對被監禁者必然產生不同的身心感受。監禁和釋放都與工廠的工人和老闆之間的衝突和矛盾相關，使工人和老闆之間在利益、權利和義務上達到相對平衡。工廠是工人和老闆發生衝突和矛盾的直接場所和環境，是衝突和矛盾的舞台。衝突和矛盾的結果是老闆被趕下舞台，或者工人被趕下舞台，或者兩敗俱傷，然後互相妥協退讓。

五

甚麼是造反？誰是造反者？造反者如何造反？造反者為甚麼造反？薩特的核心問題是，造反與理性之間究竟有何聯繫？如何運用造反權？有理造反，是一種革命行動，絕非莫名其妙，關於造反之言也非胡言亂語。革命是造反的升級。無理造反，無異於無理取鬧，便是反革命行動。造反與理性之間建立的關係，表明造反與理

性共存 (coprésence, coexistence)，既然如此，造反必須聽從於理性，受理智控制和指揮，還允許人們議論、爭辯、思考。我們作為造反者的旁觀者，應當擁有足夠的評判力，能夠從眾多的造反行動中辨別出哪些是理性造反，哪些是非理性造反，還要區別真正的理性和虛假的理性。只有那些具有真正理性的造反，才值得我們擁護和支持。如同反對一切非正義的戰爭一樣，我們還要反對那些盜理性之名的所謂造反。真正的理性可能阻止反動的造反。虛假的理性具有欺騙性，理當遭到懷疑和批判。

薩特強調真正的理性與正義的造反相結合，這對我們今天思考同類的歷史現象和現實狀況具有啟發意義。就造反而言，有法國的造反、美國的造反、英國的造反、中國的造反……不勝枚舉。造反在時間上也存在着種種類型：過去的造反、現在的造反和將來的造反。造反還因民族不同而各異。可見，造反不是一個單一含義上的概念，而是一個複雜概念，也是一個令人膽戰心驚的概念。我們反思造反，必須弄清造反的語境、背景、環境、範圍以及性質，也必須界定造反，不然難以弄清楚「甚麼是造反？」這個基本問題。在中國現代史上，出現了「打倒一切」、「破壞一切」、「否定一切」、「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等災難性現象——十年浩劫。這裏的「造反有理」的「理」已經演變成「扭曲的理」，即「虛假的理性」，亦即「無法無天」、「至高無上的理」、「最高指示」。這種理必定無視國家法律、文化遺產和社會公德。在這種理性支配下的造反只能是非正義的造反，即非理性造反。這種造反盜用了理性之

名，行非理性之實，必然帶來巨大災難。如果造反者進行非理性造反，必產生野蠻後果和國家災難，並且當其人性盡失，就會蛻變成獸。

非理性的造反者必定是瘋狂的群氓。今天的中國知識份子應當有能力對十年浩劫時代的非理性造反進行深刻反思而成為其闡釋者。然而，當時的知識份子只能成為這種造反的犧牲品，為甚麼不能為自己的尊嚴和人民的正義而據「理」力爭？為甚麼不能像薩特他們那樣為理性辯護？因為中國紅衛兵的非理性造反或野蠻性武力行動憑藉報章雜誌的「大黑體字」和「最高指示」佔了絕對優勢，因為真正的國家法律、文化遺產和社會公德被「野蠻性破壞性造反」這個高於一切的「歪理」所取代，因為科學、民主、自由的空氣蕩然無存並且缺乏薩特等人所具有的理論道說環境，因為當時的整個中國完全處於絕對非理性或絕對不講理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各種媒介充斥着「大批判語言」（或者我們今天叫做的「文革語言」），這種語言無疑將本已相當野蠻的行徑推向所謂的「合法地位」，而堅持正義的知識份子根本無法讓他人聽見自己的聲音，無力反思與闡釋這種非理性造反。他們想講的真正的理性不可能抵抗身強力壯的紅衛兵的武力，反而被迫順應這一可怖的潮流，否則等待着當右派、被抄家、遭下放、挨批鬥、蹲牛棚、坐監獄。當然，當時也的確有不少正義勇士為堅持真理而戰鬥過，但與紅衛兵的力量相比，畢竟顯得過於脆弱了。說理的力量遠在動武的力量之下，武力到底是硬的東西。

可喜的是，歷史現象總是交替發生着的，中國的非理性造反時代結束

在文革十年浩劫中，出現了「打倒一切」、「破壞一切」、「否定一切」等災難性現象。「造反有理」的「理」已經演變成「扭曲的理」，這種理必定無視國家法律、文化遺產和社會公德；非理性的造反者必定是瘋狂的群氓。今天的中國知識份子應當有能力對十年浩劫時代的非理性造反進行深刻反思。

近三十年了。中國自文革結束之日起就迎來了科學、民主、自由的春天。今天的中國知識份子，特別是那些親歷過這個時代的知識份子，完全可能成為這個時代和當下現實的反思者與闡釋者。除了我們自己的思想判斷力之外，薩特等西方思想家的政治哲學也可成為我們批判地借鑒的理論資源。

只有符合正義的造反才是公正的行動，否則就是不公正的行動。真有理、毅力、力量，構成「做（造反）」的基礎，造反才能成為正義的「做（行動）」，這樣的造反才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這樣的造反才是正確而有價值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不造反，就是非正義的。有理造反，是正義與真理的基礎和根據。沒有理由去造反，沒有毅力去造反，沒有力量去造反，則構成「不做（不造反）」的基礎，「不做（不造反）」才是符合正義的選擇，才是正確而有價值的；相反，造反便是無理取鬧，就會很糟。無理造反，是非正義和謬誤的基礎和根據。

在正義的造反與非正義的造反的相互參照中，我們會弄明是非、曲直、可否、真假、善惡、美醜。如何選擇是否參加造反或正確地反思造反，並不是容易明朗的，因此，對於發生着的造反，必須首先尋找其起因和理由，進而選擇是否同意和堅持造反。總之，要敢於且善於使用我們的理性和造反權，才能獲得造反的勝利和正確的社會後果。

我們要善於控制造反，這是造反的節制或適中問題。所謂節制就是使造反適度地發生、進行、收場。不過份造反，只能適度造反。這便是理性。做甚麼都不能過度，過度就不德

而罪。「行善積德過了頭，常人就應稱為瘋子，君子就應稱為小人。」賀拉斯 (Horace) 這樣定義「節制」。一切正當的造反一旦過份進行就必然受到譴責。有節制的造反，才能把造反控制在理性和正義的範圍，造反者才可配稱為「常人」、「君子」、「理性者」、「正義者」。過份造反有百害而無一益，造反者作為常人、君子、理性者、正義者，應當懂得有害與無害、有益與無益的限度。否則，有害現象就會肆意損害民意。總之，別超越理性。這正是造反者在政治生活中必須遵守的內心的道德律令。

法國知識份子極大關注社會和政治事務，是法國人獨特敏性的典型反映。薩特的造反觀與1968年「五月風暴」和法國左翼密切相關，正是這種典型反映的自然延續。

註釋

①②③④ Philippe Gavi, Jean-Paul Sartre, Pierre Victor, *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 discussions* (Paris: Gallimard, 1974), 147; 147-48; 150; 153-54.

④ 參見趙俊傑：〈與納粹的戰爭仍在進行〉，《南方周末》，2000年4月21日，第3版。

⑤ 菲爾茲 (A. Belden Fields) 著，張振成譯：〈法國的毛主義〉，載王逢振主編：《六十年代》(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頁114。

如何選擇是否參加造反或正確地反思造反，並不是容易明朗的，因此，對於發生着的造反，必須首先尋找其起因和理由，進而選擇是否同意和堅持造反。總之，要敢於且善於使用我們的理性和造反權，才能獲得造反的勝利和正確的社會後果。

于奇智 法國普羅旺斯大學哲學博士，現為華南師範大學政法學院哲學所教授。